



朱熹怎样讲“四书”

□ 李文文

唐代以前，儒学以五经为经典，《论语》和《孟子》尚未正式列为经书；《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未有特殊地位。四书并重始于北宋，而正式结集则成于朱熹。在宋代代理学家心中，四书亦是经学，与其他诸经相比，四书的地位更为重要。《四书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是朱熹一生用力最勤的著作。钱穆先生称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可见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四书学所占分量之重。

四书是一个整体

朱熹将四书视为一个整体，其间的联系甚是紧密。依朱熹言，人之所以为人、人不能不学的道理，以及正确的学习次序，都可以在四书中找到答案。他多次强调读四书的次序，先看《大学》，次《论语》《孟子》，次《中庸》。如果在四书上真正下功夫，涵泳于字字句句，再联系自身看透彻，将一生受用不尽。

对于四书各自的特点及其整体联系，朱熹阐述精妙。在《朱子读书法》中，朱熹谈道：《大学》，是先圣先贤流布万世、施行教化的至高经典，它面向全体天下后人而讲；《论语》《孟子》，为一时、一事而阐发道理，记录着随机变化、具体讨论问题的观点；至于《中庸》，是儒家传授的至高思想，后世学人恐不能轻易领悟。朱熹认为，《大学》贵在提挈纲领，如果没有对于《大学》纲领的总体把握，将很难理解《论语》《孟子》的精微要妙；如果不学习《论语》《孟子》，做不到融会贯通，将无法理解《中庸》的归旨意趣；如果达不到《中庸》高度，又如何能立定天人之际的大本大经，进而参论天下大事呢。

所以，要从整个上认识四书、理解四书、领悟四书。通过《大学》，提挈纲领地学习垂世立教之大典；通过融会贯通《论语》《孟子》，理解应机接物之精微；接下来，体悟《中庸》的高度，立定根本，筹谋大业。因此，依朱熹言，读四书，不能泛泛而看，须“循环不住温习，令其烂熟”。

论《大学》

《大学》因何而作？朱熹《大学章句》序言谈到，《大学》一书，正是古代大学的教人之法。在古代，大学之教盛行，教学的节目次第甚为详细，为人君者能躬行君子，所教之事多在民生日用纲常伦理之内，于是世人皆学。古昔盛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

时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道衰颓，教化、风俗皆颓败。孔子取诸先王之法，以诵以传，诏明后民。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朱熹认为唯曾子之传得其宗，再至孟子。孟子没后，书虽存，知其意者不多。这里讲到的“曾子之传”，正是《礼记》本《大学》，又称《大学》古本。自孟子后，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空档期，直至北宋二程接孟子之传，尊信《大学》。

关于《大学》的章次，二程认为有错简处，重新编定了次序。从二程那里，朱熹不仅继承到发明《大学》的旨趣，同时也关注《大学》的编次。他重新调整了次序，分别章节，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称为《大学章句》。与《大学》古本相比，朱熹本《大学》区分了经、传；调整了部分顺序；增补了传文，以使其书看起来“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

在四书中，朱熹认为要首读《大学》。因为《大学》一书，说古人为学大方；《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做人做学问，皆贵在先掌握纲领，纲举目张。朱熹多次阐明《大学》就是纲领、纲目所在。这个纲领正是《大学》所言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三纲八目”中，朱熹又尤其在意“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以此作为《大学》的最初用工处、最初下手处。

论《论语》《孟子》

朱熹常将《论语》《孟子》并谈，此二书不可或缺，相参而读为妙。他教导弟子，将《大学》读得十分熟了，便可读《论语》《孟子》，他说《论语》《孟子》都是《大学》中肉菜，先后浅深，参差互见。

关于读《论语》《孟子》之法，朱熹引用程子之言，置于《论语集注》正文之前。他继承发展了程子的思想，将“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作为读圣贤书的要旨所在。引发人们思考圣之所以为圣，而吾何以未至未得。围绕这个中心命题，句句以求，昼诵其味，中夜以思，在一幅与圣人同在的全景画面中，以求见得“圣人之意”。

与六经相比，朱熹言：“《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这是因为《语》《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在他看来，在圣人留下的经典中，只有《论语》《孟子》用词平实易懂，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读了之后疑问少而收获大。朱熹建议人们看文字要看平易正当处。由此也见《论语》《孟子》的行文特点，在于“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

做人和做学问，朱熹皆强调“做工夫”（同“功夫”）。在他看来，孔、孟皆在教人做工夫，《论语》《孟子》正是教人做工夫的典籍。朱熹认为今人读孔、孟之言，看得有点草率了。草草看过，就容易从字面上去看他们的不同，用心去读，会谈到他们的一脉相承，体用一贯。以“言忠信，行笃敬”为例，好像只言平实之事，未及根本是何。等到学者自己将工夫做到位，自然会见得“体”大概就是如此。什么“体”？至孟子，又恐人读不懂，就讲得更直接，如“恻隐之心”“学问之道，求放心”，心即体。心之所在，言行自然忠信笃敬。朱熹读出其中的真滋味，认为孟子说得“渐渐亲切”，原其本



质只是一事。孔孟教人做工夫，即以心行事，事在心中；以事验心，心在事中。

论《中庸》

读《中庸》，朱熹直言《中庸》学习难度很大。《中庸》讲述“天命”“性”“道”“已发”“未发”“诚”等范畴，学理深奥，没有一定的基础，难以读懂。朱熹提醒他的学生，读《中庸》要做一个准备，即先下功夫去读《大学》《论语》《孟子》，将此三书搞明白了，《中庸》也就懂了一半。

《中庸》为何而作？朱熹认为子思作《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及道学、道统。道学正是诚诚恳恳地奉行中道之学；传继道学的传统是谓道统，这样的传统由来久矣。自上古以来，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圣圣相承。至孔子时，续接道统之传，颜子、曾子得其宗，曾子再传至子思。至子思时，学术与时势已是“去圣远而异端起”的局面，这引发了子思深深的忧惧，惧时间愈久愈失其真。于是，他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忆及祖父孔子、老师曾子之言，加上自己的理解，作《中庸》。

如何奉行中道，朱子谈及道心和人心。《尚书》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上古时期的圣哲对于人心、道心基本性质的描述。人心，深不可测；道心，精微深奥。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唯有以精一的态度，诚诚恳恳地奉行中道。

朱熹谈心，将其定义为“虚灵知觉”，虚灵之物，有知有觉。人本是只有一心，何以会产生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朱熹认为在由理到气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若生于性命之正，此是道心；若生于形气之私，是谓人心。此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别，却是同一心。到每个具体的心，没有谁的心完全是纯

粹无杂的道心，这是因为人在成形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有形气之私，所以虽上智之人也不能无人心；也没有谁的心尽是私欲人心，这是因为人皆有其仁义礼智之性在，即使是下愚之人也有道心。这样看，道心和人心相间相杂，组成同一心。朱熹提醒世人，人心、道心的相间相杂甚是微妙，仅在方寸之间，今言一念之间，如果不知道如何治之，就会使人欲尽占上风，天理败下阵来。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朱熹言“凡学须要先明得一个心，然后方可学”。发挥心的“精一”之功，以其“精”来体察道心，使人心紧紧追随道心；以其“一”来守住本心之正，不偏不离。在“精一”上用功，无少间断，道心成为人身的主人，人心听命而行，于是“危者安、微者著”，道心昭昭。《中庸》正是这样一部典籍，教人变化气质，遵循本性之自然，光复道心。

镕铸群言，于“述”中“作”

对于朱熹注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注到一个细节。朱注《论语》“瑚璉”一条与《礼记·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这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但是却不知道朱注“瑚璉”，用的是东汉经学家包咸注；注“曹交”，用的是东汉经学家赵岐注，并不是朱熹的杜撰。又如“夫子之墙数仞”章，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章，注“八尺曰仞”，看起来存有矛盾，其实“七尺”朱熹用包咸注，“八尺”采于赵岐注。

这个细节恰恰反映出朱熹遵从“述”的传统，镕铸群言，于“述”中“作”。也正是因为其“述”的功底深厚，使其“作”根植于肥沃的土壤，进而有了集大成之作。但是，自明代以来，攻击朱熹者以为其疏忽于名物度数的考证；而尊朱熹者以为这样的问题只是枝末小节而回护之，其实，两者均未真正洞悉朱熹本旨，未见朱熹著书之意。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警醒世人“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此处所言之根本，正是遵从“述”的传统，镕铸群言，于“述”中“作”。

宋理宗宝庆三年下诏：“可特赠熹大师，追封信国公”，提倡士子们习读朱熹《四书集注》等著作。其后直至清末取消科举的七百余年里，《四书集注》成为古代文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其地位与五经相媲美，其理论、思想、观点成为知识界辨别是非正误的标准。



（上接1版二条）同时，红军及时抓住两名纵火的敌特分子，予以严惩，以澄清事实。鉴于火灾严重，红军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向受灾群众发放了2000多块大洋的救济款。此举不仅帮助受灾群众渡过了难关，而且还使得寨子里一座历史悠久的鼓楼在火灾中保存了下来。为了纪念红军救火的恩情，当地侗族群众后来就把这座鼓楼称作“红军楼”。

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少数民族群众打消了顾虑，纷纷将粮食、菜干等拿出来送给红军。当红军离开时，他们都站在路旁，表示欢送，依依不舍。还有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在红军宣传的感召下，毅然参加了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

（二）

1935年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经冕宁北进，进入彝族居住地区。为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和一个工兵排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

长刘伯承兼司令员，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先向大凉山彝族居住区进军。

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的欺压，这里的彝族人民与汉人有隔阂，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居住区。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居住区，红军各部队普遍深入地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要求红军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总政治部还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5月22日，红一方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地区。当部队行进到“彝海”时，被彝民拦阻。红军先遣队反复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并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经过积极争取，刘伯承按照彝族的习

俗，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并赠送他们一些武器、弹药。当晚，刘伯承又邀请小叶丹叔侄等人一起返回红军营地，设宴热情款待。其间，刘伯承将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和随身携带的手枪赠与小叶丹，并当场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

“彝海结盟”以及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成立，加深了汉彝两民族间的兄弟情义，这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创造了条件。之后，在小叶丹的带领和帮助下，红一方面军主力经过7天7夜的行军终于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为了感谢彝族兄弟的帮助，红军指战员向彝族兄弟赠送了礼物。

（三）

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黔西北苗族聚居区。为了消除苗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同14位苗族群众谈话，告诉他们红军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苦老百姓求解放的队伍。听了王震的话，

苗族群众很受感动，认为“苗山的树林根连根，苗汉穷人心连心”。在红军的帮助下，苗族群众建立了苗族独立团，推动了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

1936年5月，红二方面军到达云南中甸。这是一座只有几百户藏族人家的山城，城外有一座名叫归化寺的喇嘛寺。当时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山林，寺院的僧众也紧闭寺门。为顺利通过藏族居住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在中甸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实行现金交易，公平买卖。为了打消藏族同胞的顾虑，红军又发布“严禁入寺庙”告示。另外，红二十五军长征至甘肃静宁县城以北25公里的兴隆镇、单家集（今属宁夏）等地时，也很注意团结回民同胞，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其间，红

（上接1版一条）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打通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实现以系统之治破解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约，为我们在跨界交叉集成创新的时代，通过要素流动融通创新，推进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视界和理论源泉。

深化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管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形象地比作点燃科技创新这一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要在科技、经济社会两个方面同向发力。这一创新的系统观不断引领科技改革向深水区全面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科技管理职能要向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转变。要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加速中小企业、高技术企业、年轻人成长，拆除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这一系列科技创新全面改革的组合拳，为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第一生产力和第一资源的活力潜能，提供了坚实保障。

真正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创新主体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极大地激励着各类企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他多次强调要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为我们整体把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关键抓手。

以开放、信任、合作的胸怀联结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科技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推进，科技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深入协同发展，对人类文明演进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科技要更多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开放创新中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人类科技、文明繁荣发展的开放胸怀，为我们准确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义和实现路径提供了战略遵循。

向善立信，提升科技治理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科技的社会功能发展规律，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让科技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把科技治理摆在与科技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科技这一快变量有机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整体，标志着我们党对治国理政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科技桥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强调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同各国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在开放、信任、合作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科技界一定能够更多地发挥科技交流使者的作用，为全球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架起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

总之一，红军在长期间十分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同胞，不仅宣传了革命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而且还同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正因为党和红军处处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时刻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才得到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极大地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青海时所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了，我们这个党能够发展壮大起来不容易，夺取政权不容易，建设新中国不容易。为什么老百姓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们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各民族谋幸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